

舊遊往事(二)

周蜀雲

大夏大學教書記

王校長家人都友善

王伯羣校長於民國三十三年在渝逝世。他掌大夏多年，以在貴州這段期間最為辛苦，常奔走渝筑道上，既備位中樞，又隨時隨刻要顧到學校，大夏之能在黔省安定發展，固然是靠全校師生的努力合作（大夏創校是師生合作，一直保持著師生合作精神），但王伯羣校長領導之功，實不可泯滅。

我所見到的校長家庭，除他夫婦外，當時有一子三女，後兩年又生一女。他的弟婦王文華夫人寡居多年，僅有一女，時肄業大夏，也與校長夫婦同住，餘者為佣人。公館是貴陽少見的一座三層洋樓，相當漂亮堂皇，還配上一個有水池的大花園，園內花草雜陳，水木清華，在京滬平津等地，這類所謂花園洋房到處皆有；在偏僻省市，尤其號稱「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的貴州，就很難找這樣一座庭院廣闊、洋樓寬大的住宅了。王伯羣先生和他的老弟黔軍總司令王文華，都曾參與革命，是民國以來軍政界的知名人物，尤其在貴州，是衆望所歸的閥閱

世家。

關於王文華先生之事蹟，我在京滬當學生時代，從鄉長們談論中聽到一些有關當時西南三省的风雲人物。北伐前的南京、上海，還在孫傳芳盤據中，我西南各省來到這兩個大都市讀書的學生不多，官商更少，開起會來為三省人士聯合舉行，我當時在南京所參加的同鄉會常借鷄鳴寺開會，到者不上百人，大多數為學生，名曰：「滇川黔旅寧同鄉會，故鄉友閭平時所聽所談大半為三省的軍政人事或掌故，熊克武、賴心輝、王文華、袁祖銘、唐繼堯、戴戡……等名字常從我耳邊飄過，我們到底年輕識淺，懂得有限，直到我旅筑任教大夏，常在王府走動作客，加上我個人由學生時代到社會工作十餘年來從書報讀物中所得的知識，對於過去那些耳熟的名人遺事，如王文華在上海一品香飯店遇刺殞命事件，有了更深的認識，他真是一個英年有為的特出人才，二十幾歲就做了許多驚人服衆的事。首先，他胸懷大志，認清了革命是福國利民的事業，就運用他的睿智，以民族大義分析利害，冒險去說服當時既是他舅父又是他長官屬北洋系的貴州都督劉顯世傾向

革命。當袁世凱意欲竊國稱帝，特以子爵封劉顯世以示榮寵拉攏之意，雲南護國軍興，劉顯世的态度受左右影響似甚模稜，伯羣與文華兄弟痛切進言，認袁叛國，天下討袁義師匯成洪流，袁必失敗而成爲歷史罪人，反覆陳辭，卒息劉氏之念，此一幕攸關國家禍福，歷史功罪的事件，除熱讀史乘洞悉國事的特殊人士外，恐非一般國民所盡知，王氏兄弟之功實不可泯。其他有關文華之志業（詳見何輯五先生所著貴州政壇憶往）本文不便在此多贅，可惜王文華三十四歲即爲政敵所害，他雖然不像有些政治元老，被認爲有彪炳的事業流傳後世，但王文華在國民黨的黨史上，在民國前後的西南各省政情中，他是一個曾經製造過風雲雷雨的人物，是可以被肯定的。

校長常在其寓所招待教授及重要職員商討校務，親切有禮，除研議公事外，兼有園遊之樂。記得某次餐宴之後，隨便談笑時，王校長說：「我的兩手臂比別人長得特別長，不妨就請在座同仁中推出一位個子比我高的人出來比比看就知道道了。」大家當場公推在座同仁中最爲高大的外文系主任張堯年先生（現居美國）出來比賽，先

由張教授靠牆壁站立，將兩手向左右伸直，由人在他左右手指頭端劃線在牆上爲記，然後請王校長上前在原處照樣伸手表演；不料王手長過張手許多，實則王校長比張教授身體矮得不少，王校長手臂特長，證明無疑，在場同仁既無高過張教授者，睹此結果，相與大笑。一席夜宴在歡愉氣氛中結束。王府人口不多，家中廣大的園子在平時實在顯得有點冷清，更不幸的是王氏於五十九歲時抗戰勝利的前一年在渝逝世，聞者悼惜，否則他個人的事業和大夏的前途，必有更大的發展。

貴州省保育分會設在王校長家那座園子裏，距大門不遠的一排洋房的第二層樓上，有辦公室兩間及堆積公物的房間兩大間，走廊上有時也堆了東西，均爲向公家領來或外界捐贈給保育院的物品，借用王宅房屋，爲會中節省支出。我每週必去辦公兩個下午，公畢常於離開會所前，順路拾級而上，到園子內校長夫婦及其弟婦所住之正房大樓坐談，對王宅上下人等，均甚友善熟悉。志寧女士與我既爲大夏先後同學，又在保育會共事多年，彼此了解，深相契厚，勝利前後，在渝在京晤敘亦多。來臺相處兩載，情誼更切。嗣彼因攜子女去美而分別，三十年來，雖兩地遙隔，但魚雁時通，伊人孀居異域，殊少知音故舊，歲月悠悠，誰共與語，幸有子女及兩弟在美，可慰寂寥了。每憶故人，懷念不已。

降低水準隨遇而安

我因先在四川工作一年才到大夏，因此係初到貴陽，但其他大部份教授教職員均隨校到此已

一年有餘，生活早已安定下來，後方川黔地區原較沿海省份一切落後，加上戰時物力艱難，來到後方人士所過的生活水準，真不可與戰前京滬等地同日而語。儘管後方城市由政府遷來，人口大批湧到，市面日趨繁榮，對本地人而言，已感到興奮或新奇，甚至有人大開眼界；但過慣大都市生活的關係一旦遷來這些閉塞地方，處處感覺簡陋不便，但爲大局所限，也祇好忍耐，慢慢降低生活水準，改變眼光來適應環境，「隨遇而安」。我看他們之中，有些經濟力量充裕或運氣好的，也能租到比較像樣的房屋居住，有些人竟在鄉間或山上設法覓地搭建草屋，暫時棲身，兼可減少經濟負擔。且不說教職員中比較清苦的同仁，早已結茅而居，連鼎鼎大名社會學家大夏教務長吳澤霖博士夫婦，亦因子女衆多，城內所租房屋不敷居住，而在學校對面的山上自建草屋一座，亦僅比較寬敞，祇爲適合其夫人養病而已。藍布即陰丹士林布，成爲大家爭購之物。刷牙用鹽，牙膏僅有黑人牌較爲普遍，其他牌子並不多見。黑人牙膏亦非人人用得起的東西，我夫婦二人，當時尚無兒女，人口少，兩人均做事有收入，始能用黑人牙膏刷牙。吳家大小正是以鹽刷牙的；戰時生活清苦，凡是在後方度活的過來人，皆所熟知，今日對臺灣出生的下一代朋友說來，真是奇聞。

大夏法學院長誌志遠和他在大夏教英文的夫人宋志俠女士，他們的生活方式非常特別。諶先生貴州人，宋女士安徽人，他倆均留美學生，因在美同學認識而結合，我們同事時，他倆已有

子女多人。宋教授有潔癖，每日三餐，所用的碗碟筷子等餐具，必須在食用前放入蒸籠蒸過，方敢取用，爲的是講究衛生，怕細菌傳染，佣人爲此深感煩累，常因此辭工而去。無佣人時，宋女士仍不畏麻煩，自行操作蒸籠，其耐性實在可佩。有些同事在背後談起說：「我們也在外國生活過，從未見過講究衛生到這步田地，頓頓蒸器具，真虧她不怕辛苦與麻煩。」我們來黔以後，因陋就簡，早把上海住租界的生活方式收了起來。其他各家的生活情況，以個人習性及經濟能力之不同而有差異。然而當時因黔川等省生活費用比下江各省低廉，農業社會佣人好雇，工資低，我們教授家中十之八九皆有佣人；不像今天在臺灣，有錢也雇不到，弄得有些子女衆多、家務繁雜的主婦苦不堪言，這也算抗戰期間苦生活中的一大享受！

每逢假日結隊旅遊

學生們對着陽春煙景，星期日必成羣結隊出發作遠足旅行，爬山涉水，不畏辛勞。教授們多半攜着妻兒，在城郊附近的鄉野走走。貴陽近郊風景幽美的勝地「花溪」，是大家常去之處，從名稱上，一望而知是有花有溪的青山綠水之鄉。我夫婦約幾家同事，也去作了一日之遊，乘坐人力車，不過幾十分鐘即到達該地，置身其間，精神爲之一爽。四望雲山疊翠，一道青溪碧流蜿蜒於花徑田疇之間，漫遊中既可看到舊式農村景象的竹籬茅舍、小橋流水；又使人驚奇的發現那裏有大小不同、形狀各異的幾幢新式洋樓

，聳立在花草滿庭、佈置整齊的校園裏；原來那就是著名的清華中學，是清華校友在他們老校長周詒春的領導之下，創辦的一所頗具規模的學校。在偏僻的貴州，簡陋的舊環境裏，能有此一座位漂亮的學園，形同鶴立雞羣，自是名震遐邇，為人所矚目稱道了。當時周詒春先生是貴州省政府財政廳長，雖然身居宦海，仍不脫學者本色，以他原來是教育家的精神，創設該校，隨時眷顧，校務蒸蒸日上，使美麗的花溪，因清華中學點綴其間，更加美麗起來；無怪春秋佳日，遊人如織。當時貴州省政府的主席吳鼎昌，是民國以來在國內辦實業、辦天津大公報的銀行界鉅子，他成功的事業很多很早；在黔從政之餘喜愛吟咏，以詩人的襟懷，對花溪的清雅十分欣賞，在該地闢有一個小小的別墅，常去靜度週末，從事吟咏寫作，更常邀友好雅集，作文酒之會。他有「花溪閒筆」一書問世，使花溪之名益彰。後來成立的貴州大學也設在花溪，今天在臺的貴大師生為數不少。記得民國廿九年貴大創立時，吳鼎昌主席束邀貴陽各界首長社會名流參加破土典禮時，我與大夏幾位教授隨着王校長伯羣前往觀禮。歲月如流，追懷盛事，去今已四十餘年。吳王兩公已先後謝世，整個大陸鐵幕深垂，不知花溪勝地、著名學府而今是何面貌？思之慨然！

大夏法學院分政治、經濟、法律三系，每系有個系會，其他各院各系均有類似組織，意在使學生們於課業之外，因參加系會活動，彼此有更多接觸研討、互相砥礪並向師長請益的機會，增進師生感情。

學校由遷遷筑，經過一段大波動時期，因此各種學會有名無實。直到廿八年春季開學，才算真正安定下來，教授與學生均有增加，學生們召開全系大會，重新加強組織，並擬定了幾個必須研究的題目，作為努力的目標，由教授指導，待學期終了時再開研討會，作個總結。教授雖有七八位，多為校外法界人士來校兼任，平時下了課就走；惟系主任徐漢豪兄與我二人為專任教授，實際負責，指導學生們的機會較多，學生們說：「我們法律系是個家庭系」，雖屬戲語，亦見真切。法律學會最佳的表现是：在當時的貴州日報開了一個「法律週刊」，登載有關法律的論著，研討有關法律的問題，並設法律信箱專門解答社會各界來函詢問有關法律方面的疑義，算是對社會有些貢獻，也使學生們多一個磨練寫作與發表的機會。此事在今日的臺灣不算稀奇，然而在當年地處偏僻的貴陽，頗令人矚目。學生們編輯該週刊非常認真；充滿幹勁的青年祇要有人給予正確的領導，他們是樂於在正路上努力不懈的。

語妙天成幽默通俗

大夏西遷後，成為貴州省內八大學之一。早在戰前辦得最有名的是教育學院，因創辦人之歐元懷先生是位教育博士，也是國內有名的教育家，網羅國內教育界名流來校任教，如生產教育專家邵爽秋、教育心理學家艾偉、教育行政專家鄭通和、社會教育專家馬宗融、職業教育專家曾慎等，在當年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們不但著作等身，且均任過教育行政首長及著名大學的教授。文學院長謝六逸，是五四運動以後北伐以前上海文藝界最出鋒頭的人物，無論創作翻譯及小品文均為國人所愛讀，終年穿灰藍布長衫，瀟灑大方，常為學生講莊子，歌頌自然。文學院名教授李青崖，是早年的留法學生，他以翻譯法國大文豪莫泊桑的小說而馳名國內文壇。莫泊桑的作品，被世人公認為「寫實派」的巨擘，是李氏早期介紹到國內的。我在學生時代就愛讀他的譯作，到大夏才認識他。民國廿年左右，林語堂提倡幽默，接替在上海創刊風行一時的「論語」雜誌，即與李氏在文壇上著文研討，雙方並有過書信往還。李氏以「語妙天下」四字，觸動了他的靈感，主張以「語妙」二字作為Humour的第二華譯。林氏回答他說：「得扎論以『語妙』二字作為Humour之第二華譯，語近天然，音韻亦相近，誠有可取。『幽默』已成口語，不易取消，然『語妙』自亦有相當用處，尤其是做形容詞，如言『何等語妙』，某人太幽默，亦可說『某人太語妙』……。」他們二位所主張的譯名均為音義雙關。但「幽默」二字已漸成習慣用語，故相沿至今，成了定案。

大夏大學校長王伯羣籍隸貴州，素知貴州省內的苗彝問題複雜，值得注意和研究；過去因地方文化落後，風氣閉塞，不為知識份子所重視，國民政府西遷，本民族平等之旨，應對苗彝的教育、生活、衛生加以注意。況戰時苗彝之捐粟輸糧，應徵兵役，踵趾相接，有益抗建，如期其能與時代並進，與一般民族平衡發展，實有待進一步之努力。大夏大學文學院有社會系，教務長兼

社會學系主任吳澤霖博士，原是國內素著名望的社會學家，到黔以後即以研究西南各種問題為務，其中尤以苗彝問題為最重要，遂依王校長意旨，特設社會研究部由吳博士任主任，陳國鈞先生為副主任，擬定研究計畫，延聘專門人員，有燕大及清大畢業專研究社會學之李振麟、李植人及一苗籍青年楊某為研究員，率領本校社會系學生積極從事，先後分往省內各苗彝縣份實地調查；他們餐風宿露，博採周咨，以了解佔省內人口百分之四十，沒有文字的苗彝族。他們的語言與漢話截然不同，風俗習慣也有很大差異。在漢人心目中仍是「謎」樣的苗彝二字，向來籠罩着一種神秘觀念，甚至有種種無稽的傳說和不近人情的誣蔑，諸如「放蠱」之類。近代的人類社會，民族意識既在逐漸高漲之中，這些無謂的誤會，實足以加深苗彝與漢族間的隔膜。從國家的實際政治着想，這種專門研究工作確屬非常有意義的。

孔明鼓最引人注意

社會研究部設在教務處旁邊一個房間內，初是一小間辦公室兼儲藏室，後來因文件檔案以及收集的苗彝生活上的用具及各種物品日漸增加，乃擴為兩大間，將新闢之一大間專作儲藏之用。全校師生課餘之暇，隨時步入該室瀏覽。我也不知去過若干次，看見玻璃櫥內隨時收集來的苗彝生活用具，男女服飾及各種手工藝品，如刺繡花邊等，紅紅綠綠，手工細巧，鮮艷非凡，耀眼奪目。案上陳列着形形色色的苗彝生活照片，牆壁上貼着排列整齊的各種圖表，使參觀者對該

部歷年所做的研究工作與成績一目了然。校外人士甚至過黔旅客，對邊疆問題感覺興趣者，亦因聞名透過關係介紹來校參見，為之讚嘆不已。其中有一個銅鼓，稱為孔明鼓，傳說孔明征蠻時所用，最引人注意。這些珍奇異物，後來在貴陽公開展覽幾次，更為社會矚目，亦符合政府推廣邊疆教育之意義。貴州省立圖書館有鑒於此，隨即成立一個「特藏部」，並聘請陳國鈞先生去兼任該部主任，在駕輕就熟的陳先生主持之下，又在貴陽增添了一個苗彝研究機構，裨益地方文化不小。後來成都的華西大學與昆明的雲南大學也相繼設立專門研究邊疆民族的機構，從此中央政府對於邊疆問題之研究及邊疆教育之推廣，做得比過去更為積極。吳主任澤霖於大陸淪陷時，以公私牽累，未及逃離。專研邊疆問題的陳國鈞先生則於離大夏後，一度服務教育部邊疆教育司（即前蒙藏教育司），獲得許多關於邊疆教育行政的經驗；卅八年隨政府來臺，一直任中興大學教授，著述甚多，友邦研究少數民族及民俗學的學者專家聞名來訪，都向他索取有關此類著作，以供參考。陳教授蜚聲國際，實吾國學術界之光。

精鍊演講如話家常

抗戰時期各機關學校每星期一上午舉行「總理紀念週」，照例必有報告或講演。大夏位於西南重鎮貴陽，常有「大人物」、「名流學者」來遊或過境，因此有機會請到政要人物到校對學生們講話，是師生們十分歡迎而感興奮的事。我到臺晤見前任臺灣省政府秘書長浦薛鳳伉儷，談起抗戰

期間他路過貴陽，被他的清華同學大夏教務長吳澤霖博士邀往大夏參觀講演的事，使我們回味不置。大夏大學校長王伯羣和副校長歐元懷鑒於政府在戰時倡導全國精神總動員，特利用學生在清早集合操場舉行升旗典禮時，規定以十分鐘時間請本校教授輪流擔任精神講話；此舉非常有意義，在空氣新鮮、旭日初升的早晨，正是每一個人起身未久精神飽滿的時刻，輪到那天該講話的教授，正好步行到校，在升旗臺上與學生見面，將事前預備好的短小精鍊演辭，如話家常般娓娓道出，比平時的冗長演說，更容易引起學生傾心聆聽。學生們遇特別講得好的教授，聽得入神時，兩隻腳會在不知不覺中向講臺前移動，直到講畢散場時，大家才發現已離開了原站的位置，更接近了升旗臺，使幾十排人的後面空出了一大片場地，一則因為當年在廣場講演少有麥克風可用，同時也可見講演者吸引聽眾。好在這類場合不是上體操課或軍訓，越出劃線也不算犯規。有少數老師因不善辭令或講的內容空洞無味，散場後必聽見學生中有人在抱怨說：「清早剛起來，精神本來很好的，聽了他的話，又昏昏欲睡了……。」任何學校都有調皮的學生，平時對於他們心目中認為學術或聲望有差異的教師，其崇敬的程度也有差異；兼之有些教授並非學問不夠，而是限於語言或口才不行，致講話時的表達方式就難令聽者滿意，自會引人背後議論。記得有一次我講「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說：如果要從事一種運動或一場戰爭，必要有一個中心思想作為目標，要有一個中心人物來領導，方能成其事竟其功。例如辛

亥革命，以少數的革命黨人卻能推翻滿清二百六十八年的統治，就是靠了與漢排滿專制改建共和爲中心思想，來號召國人奮起，更有中心人物孫中山先生的領導，才能迅速成功的。北伐亦復如是，國民黨以少數的黨軍，經過長期的主義思想灌輸及嚴格的軍事訓練，再有全軍統帥蔣公中正統一指揮，有了這位中心人物，才能一鼓作氣，揮戈北向，勢如破竹，不過年餘就掃蕩了北洋系大大小小支派各別的軍閥。號稱實力雄厚，統率幾十萬大軍的吳佩孚、孫傳芳，雖曾頑強抵抗，最終仍歸潰敗，其故就在他們打的是「無目的」

的仗；當兵叫做「吃糧」，爲生活所迫的人，以當兵爲職業，貪圖每月幾塊錢的餉銀。北洋系雜牌隊伍，不過是「吃誰幫誰」的暫時結合，打起硬仗來，自不肯輕易爲某一長官盲目效死，士氣如此低落，怎能與有思想經過正規訓練的革命軍對抗？革命軍有國家意識，有中心思想，有中心人物領導，無怪少數的革命軍會打垮整個北洋系的軍隊而完成了北伐！我引證土耳其、意大利兩國的歷史故事爲例，告訴學生們說：土耳其在復興以前與我國革命以前的情況正復相同，幸有民族救星凱末爾登高一呼，領導土耳其青年黨從事革命救國工作，不久即有一個新興的土耳其出現，躋於強國之列。意大利先後出了馬志尼、加富爾、加里波底三位豪傑志士，將意大利建成一個獨立、自由、統一的新國家，可爲吾國之借鏡。抗日戰爭，我們爲反抗侵略爭生存，有蔣委員長長的領導，既有中心思想，又有中心人物，故能全民奮起，前仆後繼，不惜犧牲，最後勝利必屬

於我，決無疑義。

我那次十分鐘的精神講話，學生們聽得很感興趣，他們聽得入神時，不知不覺的在向臺前移動。

護校運動大小風波

在貴陽南明河畔一堂絃誦的大夏，忽然出現了風波，原因是教育部把所有公私立教育學院一律取消，併入國立或省立的師範學院內。大夏爲保持教育學院，向教育部數度力爭，以事關通令，終歸無效。

接着不久，教育部有將私立大學改爲國立大學之議，除教會方面的大學不計外，首先要改復旦、大夏兩校。抗戰初期兩校曾一度合併，後又分家，一向稱爲姊妹學校，那時如均改爲國立，原則上尚無不可。詎教育部提出的計畫是：復旦改爲國立復旦大學，而大夏則改爲國立貴州大學；因此又引起一股風潮。此事的起因，是戰時一般私立院校隨着政府播遷，日感困難，校舍和設備無法擴充，而公費生又多爲淪陷區流亡青年，家無接濟，學校免除收費外，還要設法給貸金或獎學金。政府有意將內遷之私立大專院校改爲國立時，首先想到復旦大夏，是其中比較院系最完整設備最充實的學校。大夏師生初聞將改國立，還興奮了一陣，後見報載復旦維持校名，而大夏則將改稱，羣情惶駭；在校師生連同各地校友，紛紛表示堅決反對，請求保持原有校名，否則仍保持私立大夏大學，以維艱難締造之光榮歷史及千千萬萬服務社會國家佈滿海內外校友之精神、榮譽

及感情。當即展開積極行動，尋求對策，組織護校委員會，一致議決以護校委員會名義電請政府保持原名。有些激烈的學生，主張組織護校請願團，推派代表赴重慶向政府請願；另一部份則認爲應用和平方式進行，不妨表明堅持的態度，本師生合作精神，聽取學校當局指示，以達成願望。同時各地校友會也函電往返，互相聲援。

校長王伯羣見羣情憤激，事態嚴重，乃召集教職員及學生代表疏導，並向全體員生講話，他以堅定而激動的語氣說：「我們的護校運動，就是愛校運動，事情發生到今天，大家表現得非常熱切，我不僅有同感，而且負着沉重的責任感和內疚的榮譽感。大夏是我一手扶植長大的，建校十八年，我作了十五年的大夏校長，對大夏耗盡了心血，而我一無所求，我對學校的愛護絕不後於你們。大夏的成敗榮辱與我不可分，我是貴州人，我把學校完整的由上海帶到貴州來，我必須完整的帶回上海去，我不能做出賣學校出賣良心的事。如果教育部要設立貴州大學，那是他們的事，讓他們去辦，與我大夏無關。教育的自由和學術的自由，正如同人自身自由一樣，它有法律的保障；學校是法人，有選擇自由的權利……。」這一極富感情和道義的話，使全校員生感動得淚下。同時告誡大家安心上課，信賴校長，靜候交涉，千萬不可激動。事後校長即起程赴渝，對教育部表示強硬態度。同時學校教授方面又公推理學院長夏元璽、商學院長金企淵、法律系主任徐漢豪三位爲教授代表，赴渝向教育部表達全體教授意願。校長與教授均堅持保留「大夏」校名，並

在渝召開校董會。校董會孫科、何應欽、孔祥熙等均一致表示支持，分向各方面奔走力爭，政府遂維持大夏原狀，在花溪另設貴州大學。

二陳先生胸襟恢宏

夏元璪、金企淵、徐漢豪三教授向教育部交涉中，有一插曲：他們三人中，夏年最長，以拙於辭令，主張到教育部晉見部長時由年齡較輕的徐漢豪代表發言，金企淵加以附和。到教育部後，徐說話較多。那時的教育部長為陳立夫先生，立夫先生見漢豪發言清晰，說理分明，談話後隨詢漢豪過去學歷及在校擔任何種功課，漢豪一一回答，並隨口說貴州天氣惡劣，時常生病，如有機會願在四川服務；當時原以為隨便談談，不料立夫先生說：「好，你就去看看果夫先生罷。」隨手寫一介紹名片。後來漢豪持片去看果夫先生，果夫先生允為設法。漢豪與果夫、立夫

兩先生素不相識，更與當時所說CC派的人無絲毫關係；與果夫先生見面後，以為隨便一句話，要人們的答覆是一時應付，不會有何結果。不料一星期後，果夫先生通知漢豪，謂與四川省民政廳長胡長清先生說妥，委為民政廳視察，囑取介紹信前往成都報到。漢豪以事出意外，考慮結果，因我尚在貴陽，未便分居，況大夏與我們淵源深厚，此次又係負有任務而來，未便中途離去，當即婉言辭謝。從這件事可以證明，外間所傳派系之說，未必盡然，而兩位陳先生之胸襟恢宏，愛護人才，無怪士林崇拜，名噪一時。我夫婦談及此事，常與感念。

大夏大學兩次大小風波，均為我所目睹，第一次風浪不大，力爭的結果雖未如願，但大家在心裏上情感上尚未受到十分的衝激，只有教育學院的師生，帶着「去猶忍淚」的心情，準備着將要離開這個濃厚感情的大家庭，投入一個茫無所

知的新環境。第二次發生的事件不同了，引出了一個護校運動的大風潮，鬧了幾個月，校務雖然照常進行，但自校長起，全校員生情緒均感不安，尤其學生們激動得更厲害，因為青年人熱情，遇事易衝動；何況與他們切身有關，共過患難的現讀學校。至於校友們離校已久，何以照樣關切這次事件？一則是基於對母校的感情；再則學校若一旦變更名稱，大夏大學即不復存在，等於是「亡校」，「亡校」的學生和亡國的國民，心情是一樣痛苦的。學生畢業某校，服務社會，是以母校的資歷與榮譽為背景，校友間也可以互相關顧，並聯絡感情，如國民之有祖國。

沒有祖國的流浪者，到處遭人歧視；沒有母校的社會工作者，一樣感到孤立徬徨。我個人雖非大夏畢業生，但曾肄業又回校任教，對學校及學生均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這浪潮中，心中也不免戚戚。

中外文史叢書 南京大屠殺

郭 岐 將軍 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軍入城姦淫燒殺，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前台灣省議員、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曾於抗戰勝利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罪證確鑿，判處死刑。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南京大屠殺」長文，連載期間，轟動遐邇，傳誦廣遠，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劊子手的下場」及珍貴圖照，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訂價新台幣壹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